

生态文明建设的 aesthetics 基础

李桂花 陈诗棋

摘要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伦理原则，也要按照美的逻辑来进行。若使生态文明建设遵循美的逻辑，需从分析其美学基础入手。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基础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和精神指引，从根本上起着导向性作用；生态美学作为中西迥异却又各领风骚的新学科，为生态文明建设搭建了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理内核的理论框架；中国传统美学作为一片肥沃的土壤，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融入了古老的中国智慧。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美学、中国传统美学共同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美学基础。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美学 生态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23) 01 - 0033 - 12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因而必须将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和未来中国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从哲学层面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与美学是密不可分的。美学主要研究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回答的是人类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即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能力以及作为对象的感性物质的审美价值等问题。因此，美学并不局限于探究“美”是什么，还要思考“美的价值”是什么，故被称为“审美理论”。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生产不断进步，人的生产与生活都需要遵循“美的逻辑”，而生态良好作为经济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吉林省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研究”（批准号：2020A19）；2021年度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批准号：JDMY2021-202）；2019年度吉林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联合课题“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鉴研究”（批准号：201904）。

【作者简介】 李桂花，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邮政编码：130012，电子邮箱：lgh@jlu.edu.cn；陈诗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邮政编码：130012，电子邮箱：3398118236@qq.com。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

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人类生活的重要福祉之一，也必然要在美学的范畴中展开，所以美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

如今，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短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仍为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美好生活的意蕴，既要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应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此乃“五位一体”建设全面协调发展之必需。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才得以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诗意地栖居。可见美学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不可或缺。

具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实践性的生态美学与具有民族性的中国传统美学分别从价值导向、理论支撑和文化源泉三个不同角度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基础。因此，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美学及中国传统美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和机制，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均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

由马克思、恩格斯率先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旨在重新定义美和艺术的本质，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人类的审美意识、美与艺术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并对艺术（美）与生产、艺术（美）与资本主义、艺术（美）与共产主义等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把一切理论建构在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以“阶级”与“异化”这两个新的切入点，突破了原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式美学理论的藩篱，彻底将美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唯物史观的、完整而有序的“地基”扬弃了黑格尔将美学等同于“美的艺术的哲学”（黑格尔，1979），它对美学全新的定义和革命性的重构使美学不再是缥缈的空中楼阁，也不再是死板知识的生硬堆砌。

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巨大，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最重要的方向和内容之一，不仅熏陶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引领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推动了美学界和美学理论体系的进步。当前，在生态文明理论建设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性思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基础中承担着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厘清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追求的美，是在主体与客体清晰且和谐的状态下，按照客观实在的自然之美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内在之美的规律和尺度，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它否定了人类对自然无限度征服与破坏的行为，指引人类珍视自然之美、建设生态文明；同时人作为生物，既要和其他生物一样同自然界相适应，也要作为实践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2012），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也不能割裂。在人们“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马克思、恩格斯，2012）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人化自然”概念就在这样的双重改造中产生了。人化自然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对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塑造了人的特性、拓展了人的感觉。因此，自然界中人的属性和本质是相对于社会的人而言的。人化自然也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入处在不断的发展与生成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明晰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辩证统一关系，即互相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是达成生态文明之必需。这既超越了将自然看作纯粹客体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超越了将自然理解为绝对观念外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同时还避免了主客体混淆的神秘主义自然观，因此完成了生态世界观在认识论上的飞跃。这种飞跃使遵循人类社会法则的人与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自然不再各行其是、互相对立，而是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逻辑上双向并行、实践上互相促成。因此，人不再是绝对意义上孤立的“中心”，自然也不再是冰冷的纯粹客观的物质。人与自然之间相互生成、相互映衬的自洽与和谐孕育了美，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基础的必要前提。

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定要强调人的主体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积极以生产实践人化自然的同时，还要主动去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万全之策。唯有如此，才不会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使人类沦为自然界的“独夫”。同时，也要懂得自然并非是为了承载人类实践而生的纯粹的“对象”，人类要像爱护自身一样去爱护人的这一“无机的身体”，还要警惕资本逻辑下将自然完全客体化与对象化的理念和行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必须及时从沉浸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的状态中彻底清醒过来，并将“胜利”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即人在保持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不将自然看作是纯粹用以生产开发的客体，而是赋予其人性化的意义，使其获得主体般的重视、尊重和保护，进而取得人类和自然的双重胜利。可见，只有彻底厘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指的哲学上的“美”，进而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其次，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摆正生态文明建设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追求的“美”，是人之于自然和人之于人的双重解放，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人的解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基础中，同样包含了个体与整体相互适应且以美的方式存在的要求。在此需要区分两对不同的概念，即“人与整个自然界”和“人与整个人类”。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种群，是自然的“子集”，相对于自然界这一整体而言，人类是一个个的个体，但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2018）。人类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自然的

历史和人的历史密不可分，人的劳动和实践造就了人化自然。因此，人以自然同人发生关系的方式，去同自然发生关系，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向人生成。此时，人跳出了和自然的从属关系，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这种关系也缔造了美。马克思认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恰恰是人的“类本质”的重要体现（马克思，2018），那么人应该如何与自然发生关系呢？这要师从自然本身。自然之美，在于它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所以，人能欣赏的美，皆是自然示人以“友好”的那一面，即能为人提供生存与生产环境和条件的那一面；而人若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则要通过实践，以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把由人所创造的美用于与自然的交往中，即将人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相契合。

相对而言，个人之于整个人类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是容易理解的。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部分人因缺乏整体意识，为了短期的个人利益产生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这种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做法，无疑因为没有解决好部分与整体的矛盾所导致，此种带有深深“重占有”烙印的思维方式所引发的贪婪、愚蠢的思想和行为，折射出了人类的丑态，他们在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过程中动摇了自然之美的根基。

归根结底，引发个体与整体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衍生出的资本逻辑。因此，我们要摆正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树立整体观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凡事算大账、算整体账，不能损公肥私、各自为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以全局意识协调整体、以问题意识解决积弊、以红线意识约束行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保护与整个人类休戚相关的生态环境。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才能有生态文明之美相伴。

最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重塑生态文明建设中规律与实践的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追求的美，其核心概念是“生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独特的理论基石，也是区别于唯心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生产作为一种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本身，也创造了美，美的规律不仅被置于牢固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也与实践紧密相连。

实践在美学世界中鲜明地标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超越了动物那种局限于自己物种单一尺度的生存，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去从事生产，而且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2018）。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定义的“美”实质上是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内在尺度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所独有的能够把握美的规律的审美能力，外在尺度则是自然规律，两者统一的基础即是实践。在此过程中，既要把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认识内化为人类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规律，又要将人类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规律重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认为的“美的逻辑”就是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双向推进、尺度合一，这是人的美感与自然美感相契合后塑造出的一种新的美感，是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基础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重塑

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与审美规律）与实践的关系时，既要尊重客观规律，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在此基础上以美的逻辑将二者统一于实践。

马克思指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马克思，2018），所以作为主体的人也应像看待自己的同类一样看待其他的物类。放眼世界，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以资源掠夺和资本输出为手段、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之所以不可取，就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既没有尊重自然的自净能力和生态的繁育节奏，也没有遵循美的规律使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相照应、相符合，从而导致了实践的负面效应，生产出与美和善背道而驰的丑与恶。人类的辛勤劳动却结出了被自然报复的苦果，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是、也应当是生态文明与美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作为考核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必须首先重塑规律与实践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良好、文明进步，最终实现美的跃升。

二、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

生态美学的学科归属，因其起源及发展特征不同，一直存在争议。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态美学有中西两个理论源头，其中发源于中国的被称为中国生态美学，而西方则以欧陆现象学之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美学之生态美学为主。而生态美学理论的主要流派，又以不同的生态世界观作为区分，形成了两种迥异的研究范式，即主客二分模式和与之相对立的生态整体主义模式。总而言之，生态美学作为一门随着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新学科，尽管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关注的皆是人类普遍重视的生态存在之美，在研究和探索中都寄予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真挚善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是作为美学理论存在意义上的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在国内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始于2007年生态文明建设被确立为中国基本国策之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①，并将其定为战略目标，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并非一场运动式工程可一蹴而就地实现中国美丽乃至世界美丽，必须在思想和实践层面进行双重改造，通过确立生命共同体的共识，认识到自己是在与自然同命运、共呼吸。这不仅符合最广大人民的福祉和中国的发展目标，也与生态美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诉求不谋而合。人类只有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才能保护自身的生存，从而真正诗意地栖居，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所努力倡导的。

新时代，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美学基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美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理论突破。中国生态美学正在打破中西壁垒，吸收西方生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态美学的合理成分，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方法拓展大众对于生态美学的整体认知。

首先，生态美学强调总结过去经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理论和审美理论。西方生态美学建立在生态理论和审美理论的完备体系基础之上，在其系统内部，根据两种不同的形成轨迹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态世界观。其中，以生态学为源头的生态美学属于主客二分的生态世界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发端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生态理论和环境科学，以此为基点，在呼唤美的价值、拓展审美对象宽度与广度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的对象化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从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第一次将视角从人类自身切换到其他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之时，便为生态哲学与美学研究奠定了生态世界观的基础，此后作为美国科学家与环保主义者的利奥波德将进化的视角融入了土地伦理学与美国新环境理论，开创了生态伦理学；英国博物学家怀特则将对生态现象的论述上升到了哲学与美学的高度，而“深绿”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们则将这一世界观进一步推向了人与自然“泾渭分明”的高潮。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以哲学或审美理论为基点的生态美学则属于主客观统一的生态世界观，因其在源头上带有主体自我审视和反思的审美基调，因此在发展中烙上了深深的人文印记，因而更加倾向于将生态美学描述为人类参与的美学。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率先以“我的确在这里劳作并在我自身上劳作，我自身成了满是艰辛和汗水的田地”（海德格尔，2019）的论述，从认识论的角度反对了机械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弥合了“人”与“世界”的分裂；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格里芬则指出，世界与生态系统实为一体的“应然”，并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深刻揭露了生态异化现状的“实然”；美学家桑塔耶纳则公开驳斥了康德“无利害”的审美倾向，力主审美有利论，认为美感作为一种价值，是对人“自然功能”的满足，且需要人类全身心、多感官去参与（曾繁仁，2010）。这些拥有整体世界观的生态美学理论也在发展的过程中超越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自然界完全排除于价值与崇高之外的观念（康德，1964）。不同的生态美学生成逻辑，形成了迥异的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治理思路。

在中国，由于物我合一的文化理论传统，使人们无论是真的记叙自然事物，还是以此暗喻人伦道德，都倾向于将美学的意蕴融入生态或者自然事物之中，因此历史上对生态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约而同地涉及生态美学，这是生态理论和审美理论奇妙的殊途同归。虽然中西两种生态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路径大相径庭，但二者却具有共同特点，即善于总结过往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曾经生态问题的治理也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任何问题的暴露都需要时间，对于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之道的提出，需要经过理论升华与实践探索。因此，从时间与逻辑两方面来看，要做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长期工程，就必须善于回望与反思，既要吸收生态理论发展的经验，也要借鉴审美理论构建的经验，并使它们有机统一于中国生态治理的实践当中。

可见注重对以往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的要求，也是生态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契合的重要体现。同时，生态美学还要求我们在生

态环境问题上，既要重视传统生态学所展示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即寻求自然作为客体本身的美，也不能忽略美学和哲学所蕴含的生态世界观和美的整体性，即追求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美。对于学科本身而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基础之一的生态美学，致力于改造传统的审美话语体系，使之成为兼具科学的意识与方法、审美的意蕴与追求且能融会贯通的新美学，即重构美学。这便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生态友好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两个重要且平衡的理论要素。

其次，生态美学强调聚焦当前的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搭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生态美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天然崇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在为学科建设增添理论难度的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而这一切来源于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态美学正是依靠实践破除了旧美学中坐而论道的虚无色彩，从而实现了学科的特色发展和自我超越，正如“深生态学”提出者奈斯在谈到生态学在社会与伦理实践中的作用时说：我们在寻求一种整体上对地球上一切生命都有益的社会、教育和宗教，因此我们也在进一步探索实现必要的转变和我们必须做的工作（雷毅，2001）。

在生态美学中，起源于自然科学流派的理论通常主张规范性，认为鉴赏自然与生态之美应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而理论来源于人文科学的流派则追求人文性，主张理解自然与生态之美应建立在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生交集的基础上。生态美学的这一特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之处在于，同样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后者的理论建设与总结工作必然更加复杂，其来源也更加丰富多元，因此必须在实践中搭建好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审美性，即科学性的实践须符合审美的要求，审美性的实践须运用科学的方法。

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深度有机结合，才能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从而使其在充分发挥两种不同学科体系优势的同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大放异彩。令人欣慰的是，此种跨学科的理论构建模式在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中确实有所体现。总之，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保护环境与维持生态平衡的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才能使生态文明理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实践。

注重当下也是生态美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品质之一，因为生态美学对于变化十分敏感，也高度重视。从《沙乡年鉴》到《寂静的春天》，这些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之作无一不是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态的强烈责任感，通过细致的观察和亲历的实践来记录自然环境微小的变化。在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也应当具有这种立足当下的精神，在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下，将其打磨成一个精细工程，就像几代塞罕坝护林人一样，悉心照料每一片绿色，为生态环境注入精神文明，成就生态之美。

最后，生态美学强调面向未来，可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态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注重人类生产与生态相联系，因其学科性质的缘故，常常将传

统的“形而上”美学与科学相结合，在将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连的同时，也积极探究人类活动“美”的向度和可能性。作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美”似乎是抽象而感性的，虽然来源于生产实践，但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又有一定的距离。正如生态美学中的“美学身体化”理论，认为美既是实用的又是抽象的，既是身体感知的又是文化参与的，因而审美既是生活实践的又是文化信仰的，这便把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同样，“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看上去以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的形式而存在，似乎应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实际上生态文明也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是物质的、实践的，是和经济基础乃至整个人类生存休戚与共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生态环境的优劣是检验发展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美”则是另一块试金石。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还使人们拥有了创造美的条件和享受美的空间，两块试金石的辩证统一关系，便是生态美学的研究范畴。作为一种研究生态与美相结合的学科，生态美学搭建了人类生产发展与身体力行之美通向精神文化之美的阶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既要注重人的身体感知，即物质需求的满足，也要注重人的文化感知，即精神需求的满足。总之，只有通过实现生态文明才能以美的经济基础决定美的上层建筑，再通过美的上层建筑对美的经济基础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中国传统美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源泉

中国传统美学是以儒家美学思想为主体的美学和审美理论，追求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实现，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精神。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来源多样且兼容并包，所蕴含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禅宗三种审美理论既相互碰撞又水乳交融，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强烈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美学善于论证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伴随中国古代社会伦理发展始终，具有较强的政治与伦理色彩；西方美学则倾向于将美学与认识论、科学理论相结合，更具科学和哲理色彩。

如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新形态呼唤世界美学新格局。中国传统美学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改革开放大潮与全球化浪潮中正在抓住机遇，积极吸纳西方美学体系的构建方法，主动走出国门去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活动。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在国内重新点燃了学界的研究热情，也成为了世界美学花园中一朵备受瞩目的蓓蕾。

首先，中国传统美学有助于找准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纾解人与人的矛盾。生态问题根源在于人类社会，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矛盾若在发展中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随着量的积累最终引发质变，致使矛盾激化，从而衍生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等诸多矛盾。因此，纾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一项应该得到重视的工

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着力点。在中国传统美学中，道家美学相信“夫唯不争，故无尤”^①，这种清虚委婉、深慧如水的审美取向所孕育的为人信条和处世观念，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颇具智慧的解决之策。中国传统美学以道家美学水一般的“谦柔”之美，启迪人们摒弃贪婪好胜之心、放弃汲汲营营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与他人的非理性竞争，通过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不再做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道家美学为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一缕轻盈之美，在这一视域下，生产和生活更容易回归人的需求本身，就如同庄子所描述的逍遥游一样“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②，如果人们不为外物所牵绊了，也就不会以无止境的占有为乐。“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等道家美学思想还启示我们，无论是对于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环境而言，都要遵循客观规律，这不仅是智慧之所在，也是“大美”之所在。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妄为”不如“无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适当地休养生息，允许自然发挥其自净和自我修复能力，“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明智之举。

其次，中国传统美学有助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点，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儒家美学推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③。古代圣王贤臣的治国之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价值，可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审美观普遍认为，美是“仁”，即仁爱之美，意为人与人互助互爱、和谐友善；也是“礼”，即秩序之美，要求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要与整个社会相一致，做到统一而守“序”，此“序”包括自然秩序和法律秩序。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就是要通过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发挥社会的教育功能，使人们能够有意识地遵循自然与生态的客观规律，做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④，即时刻遵守德行，仁爱且克制，对自然的索取适可而止，不去放纵贪欲、行竭泽而渔之事。此外，还要将掌握万物的运行规则并加以妥善安排作为“王制”的重要标准，从而实现“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⑤，唯有如此，整个生态才能秩序井然、各安其命，保持在适当的秩序中。汉代儒家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特色的美学理念，它将秩序之美体现到了极致，其中的“天”可作为泛指的自然来理解，寓意人类和自然同为一体，人是“天”的载体，要“奉天承运”，即要自觉顺应自然法则，主动去维护自然规律的运行，还要“替天行道”，尽力去阻止和惩罚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人或事。

上述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围绕政治与伦理讨论哲学与美学问题的倾

① 《道德经》，陆玉林注，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第28页。

② 《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页。

③ 《论语》，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④ 《论语》，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7页。

⑤ 《荀子》，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7页。

向，这是儒学审美理论能够占据“正统”的主要原因。总之，合理借鉴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运用儒家美学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点。

最后，中国传统美学有助于点亮生态文明建设的闪光点，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佛教的禅宗美学认为“万物有灵”，指万物平等且皆具灵性。这种朴素而原始的生态观念劝导人们摒弃贪、嗔、痴的错误审美取向。其中，“贪”是指对于喜好的事物过于沉湎和贪恋，从而引发偏执；“嗔”是指对于厌恶的事物过于恐惧和嗔怪，因此产生了怨恨；“痴”是指不明事情的真相和规律，从而愚昧无知、是非不分。其实，在人类发展史上，由以上“三毒”引发的破坏生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因贪图财富而偏执地对自然资源一味榨取，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因经济开发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肆意妄为，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于是，人类与美和智慧渐行渐远，在目睹了生态环境满目疮痍的同时，也见证了自身的丑态百出。

禅宗美学主张用戒、定、慧来破除贪、嗔、痴。“戒”是指斩断贪念及对外物的执着，采用一种有分寸的、合乎规律且无害的方式生存；“定”是指克服因强求不得所产生的焦躁和怨愤，通过内心的充盈和自省形成稳定的心境；“慧”则是指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再莽取愚行。禅宗思想中这些对于智慧和美的境界的描述，启示我们为了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做到戒（自律自守）、定（正心正念）、慧（修身修行）。此外，禅宗美学还主张要平等地看待一切生灵，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慈悲之心看待自然，不以功利主义衡量事物的价值。起源于禅宗的灵性、平和、圆润的美学，促使人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中国历史上有力地推动了对于自然环境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于是，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万物灵长，而是其他生灵温良的同伴与亲密的友人。

如今在私有制及西方消费主义的催化下，人类渐渐被“重占有”的生活方式所裹挟，对于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认知过于膨胀，这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日渐尖锐、生态破坏日趋加剧的直接原因。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禅宗审美理念恰好有助于人性中“善”的复归，禅宗劝导人们常怀“慈悲”、多积“福德”，并认真思考自身的生存处境，如此方能以参与者而非所有者的姿态去看待自然，这恰与生态美学的整体自然生态观相契合。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禅宗美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带来了积极影响，注入了独特的民族智慧。

四、三种美学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①。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它并未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而落下帷幕，反而在今天被寄予了更多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基础，在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价值导向、生态美学为理论支撑、中国传统美学为文化源泉的融合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价值基础和精神指引，所蕴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在哲学层面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美的逻辑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规律与实践的关系，因此在根本上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否必要、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因此是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即美学基础的“树根”；生态美学在理论层面探究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将生态理论与审美理论相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交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连通，为生态文明建设搭建了具有合理内核的理论框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美学基础的理论支撑，即美学基础的“树干”；中国传统美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天然的文化适应性和美的底蕴，其营养可以源源不断地被挖掘、被汲取、被古为今用和发扬光大，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是生态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文化源泉，即美学基础的“树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美学之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之梁的生态美学、美学之华的中国传统美学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三者不仅是学科资源的整合，也真正实现了“马、中、西”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海德格尔（2019）：《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3页。

黑格尔（1979）：《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页。

康德（1964）：《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89页。

雷毅（2001）：《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5页。

马克思（20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9、53、53、51页。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56页。

曾繁仁（2010）：《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1、6页。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Aesthetic Basi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LI Gui-hua, CHEN Shi-qi

(Colleg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t should not only respec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adhere to ethical principles, but also follow the logic of beauty. I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ade to follow the logic of beauty, the aesthetic found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main aesthetic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Marxist aesth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Among them, Marxist aesthetics, as the value bas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As a new discipline, eco-aesthetics has buil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as a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injected ancient Chinese wisdom. Therefore, Marxist aesth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together provide Chinese aesthet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xist aesth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薛亚玲